

洹上村确实已无迹可寻了。但我依然执着地认为,我的脚下,就是那个山雨欲来的傍晚,张謇跨进洹上村养寿园的地方。

听南阳的袁林讲张謇故事——“车轮上的行囊”之四十八

□黄俊生



心在路上

 到达河南安阳,我一脚直奔袁林。袁林,袁世凯墓。1916年3月,当了83天“洪宪皇帝”的袁世凯在全国上下一片嘘声中脱掉黄袍,三个月后,“祖传”的尿毒症发作,一命呜呼,归葬于时称彰德的河南安阳,遂有袁林。

 奔袁林,我不是去凭吊那个窃国枭雄,不是去观看全国绝无仅有的北洋政府装束的文武官石像生,也不是去欣赏中西合璧的墓台建筑,而是去寻找一段尘封了百年的隐秘,去倾听斜雨衰草诉说历史风云。

 踏着长长的神道,越石拱桥,经牌楼,转碑亭,穿堂院,抵墓庐,似乎穿越了时光隧道,把百年前的画面拉到眼前。

 坐北朝南的景仁堂原来用于祭袁,现在陈列着袁世凯生平史料。堂内陈列一张张謇照片和一张江苏咨议局照片,附一段简介文字,简介只说张謇曾与袁世凯同为吴长庆文武幕僚,对二人的恩恩怨怨、分分合合,尤其是清廷倾覆前夜张謇与袁世凯在洹上村煮酒夜谈的历史只字未提。是布展人的疏忽?还是有意回避?不得而知,但我更愿意相信,张謇与袁世凯会晤于洹上村,其中的隐秘太多,史料太少,对隐情莫衷一是,难以说清道明。

 我向讲解员打听洹上村在哪里,讲解员摇摇头;问景仁堂工作人员,工作人员指指厅堂正中一块石头说:洹上村没了,1947年毁于战火,只剩这一块石碑,是袁世凯长子袁克定写的村名,也是洹上村唯一的遗存。

 恰巧,一位身穿短裤背心的老者走了进来,工作人员说:他是喝洹河水长大的,你问问他。于是,老汉拉过一张矮凳,隔着门槛,向我打开话匣子:

 洹上村并没有村,就袁世凯一家宅邸,所以,老一辈都把洹上村叫作“袁宅”或者“袁家花园”。洹上村占地有300亩,就在洹河北岸,京汉铁路东侧、袁林西侧的旷野上,南边离洹河100多米,东边离袁家车站不足一公里。村子四周筑有上薄下厚的砖砌围墙,墙高而厚,很像城墙,但无城垛。墙内四角建有上下两层的碉楼。面南的围墙中间开了一个拱券式大门,门上方的墙壁上嵌一块石碑,横刻着“洹上村”三个篆体字。袁世凯死后,1927年冯玉祥把袁宅改为彰德高中,没想到这样一处豪华辉煌的庄园,居然是“豆腐渣”工程,先后有几处房屋自然垮塌,日本人来后就渐渐荒芜。我小时候时常翻过深深的壕沟,去园子里割草、捉蟋蟀。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军在废墟上修筑工事,袁宅彻底毁于战火。新中国成立后,废墟的建筑材料被用来建造文化馆,从此,洹上村就只剩下地名了。

 “老爷子,您知道张謇曾经在洹上村与袁世凯见过面吗?”

 “听老辈儿说,袁世凯隐居洹上村时,时常会见各地大员,及时掌握朝廷动态,会见张



謇应该不稀罕。”

 “那么,老一辈儿有没有说过他俩会面都谈了些什么?”

 刘老爷子朝我翻了翻眼:“两个人说的悄悄话,谁懂?”

 出了袁林,沿洹河北岸西行,我要到洹上村旧址去看看,不一定能找到旧时遗迹,就算去访古抒情吧。

 当年散发着泥土和禾苗气味的静谧旷野,已经变为望不到头的柏油马路和鳞次栉比的楼房。在一家医院,知情人说袁宅的大致位置在现今的园林局附近,去那一看,依然是办公楼与居民小区——洹上村确实已无迹可寻了。但我依然执着地认为,我的脚下,就是那个山雨欲来的傍晚,张謇跨进洹上村养寿园的地方。

 时光再一次被穿越,历史再一次被拉近……

 1911年,辛亥年,中国近代史上最为重要的一年。6月7日,在汉口出席大生公司租用汉口纱、布、麻、丝四厂合同签字仪式的张謇,受沪穗津汉四商会公推,进京敦促刚组建的皇家内阁加快立宪步伐。出发前,张謇给袁世凯发了封电报:“别几一世矣,来晚诣公,请勿他出。”火车途经彰德府,张謇下了车,他要去洹上村见一见在这里韬光养晦的袁世凯,他要与袁世凯商量安定时局的方策,自那封著名的绝交信以来,他们已有20年未曾见面了。

 袁的副官、轿子在恭候。轿子抬进养寿园,接下来的情景,史料鲜有记载,只能展开想象,去复原当时情景:

 袁世凯降阶以迎,执公之手,口称“季直师”或“啬公”,迎于上座。案上,菜已备,酒已温。菜未动几筷,酒却不止三巡。话题一定是从庆军幕僚任上开始,那时,吴长庆着袁世凯跟张謇学写作,张老师以八股文命题,而袁学生的文章“文字荒秽,不能成篇”。老师刚训几句,学生却发飙:“大丈夫当提三尺剑,立功万里外,岂甘愿死守圣教周礼之下。”一番慷慨陈词,老师大受感动,嘉许其治军之才,向

吴长庆保荐,慢慢当了先锋营军事主官,遂有袁世凯后来的发迹。

 张袁二人的会晤,一定回避了那封由张謇执笔的“绝交信”。信中,张老师对袁学生得势后的诸种言谈举止多有诟病,还调侃说:“足下之官位愈高,则鄙人之称谓愈小矣。”诘问学生:“謇今犹犹是一人耳?”而称呼却“愈变愈奇,不解其故”。

 对于老师的突然造访,学生大概始料未及吧,所以预先为会见做了“功课”,准备在话不投机时以治淮话题为润滑剂,免得尴尬。未料,二人竟能捐弃前嫌,以治淮话题为始,从七年前老师致函希望袁氏支持立宪,学生回函“尚须缓以俟时”,到对时局的评估,潮流的走向,老师与学生观念渐趋一同。

 酒已温了好几回,残羹已撤,新茶已上,原先相向而坐,不知不觉中竟越坐越近,直至把臂洽谈。师生一夜对酌,学生从老师那里看到立宪人士对朝廷已经失去信心,而对革命党也不抱希望,从而坚定了学生复出的信念。于是,一个立志把大清帝国拉下马的政治同盟在那一晚形成雏形。

 一个说:“有朝一日,蒙皇上天恩,命世凯出山,我一切当遵从民意而行。也就是说,遵从您的意旨而行。”

 一个说:“甲日满退,乙日拥公。”

 夜转深,天渐凉,学生再三挽留,老师以明日赴京为由告辞。回到火车,张謇在日记写道:“访袁慰亭于洹上村,道故论时,觉其意度视廿八年前大进,远在碌碌诸公之上。”

 相识30年,绝交、试探、结盟、蜜月,一个是莽武夫兼老政客,一个是状元公和实业家,一个把立宪、共和当作工具,一个希望政体更替、平稳过渡,他们最终会在一条道上走到黑吗?

 3年后,袁世凯称帝之心昭然若揭,张謇劝其莫学上断头台的路易十六,要做中国的华盛顿。劝说无果,张謇愤而辞官。1916年,称帝后的袁世凯加封张謇等为“嵩山四友”,派人专送一幅《嵩山四友图》来到南通,张謇闭门拒收。

 洹上村那一夜煮酒,终是苦酒。世事如梦如幻,足堪千年一叹。



 白鹤梁上唐人所见的石鱼,是古代涪陵人用以观测长江枯水水位的独特标尺。

水下石碑博物纪

□强雯



博物奇妙

 刻舟求剑,虽然是一个带有否定意义的中国成语,但纵观人类历史,这样做的人,很可能是科学家。

 知道用刻舟的方式,说明了他具有数学思维,更呈现了其严谨之态。换个角度看,他其实是在大江大海中找到一个坐标,能够考虑坐标这种方式,我们就不应该嘲笑他。至少他推动了文明的进程。比如怎样在大江大海中找坐标,有时可能是海水里的石脊、崖壁,有时可能是船。虽然石头和木舟的材质不同,但是他们确实有共性,即并不是完全稳定的。舟会随波逐流。石头会被江水淹没,时隐时现。

 但远古时期的科学家发现,有些石头的出现是有规律的,于是便在石头上画了一条线,这条线,改变了人类文明的进程。这就是水文线。

 公元前三千年,埃及人就开始了水文观测。一块记录尼罗河水位的石碑碎片是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的世界性水文观测记录,现藏于意大利西西里岛的巴勒姆博物馆。在今天埃及的非莱、艾德芙等地的神庙,还遗留有古代的水位测量标尺。它被称为“尼罗河水尺”。尼罗河水尺分为三种,一种是把水位标刻在河流的岸壁上,第二种是利用伸入河中的阶梯作为标识水位的标记,第三种是通过导管把尼罗河水引入竖井或水槽中,水位标记则刻画在井壁或水槽中央的立柱上。如此的“刻舟求剑”倒是一种非常严谨的治学态度。

 其实,除了埃及、巴比伦、中国等文明古国都是世界上较早进行水文观测的国家。不过,世界上目前唯一的一座水下碑林博物馆建在重庆涪陵,即白鹤梁水下博物馆。它是因白鹤梁水下碑林而建造,这是一块长约1600米,宽16米的天然巨型石梁。仅在春冬枯水时露出水面,石梁中间雕刻有一双石鱼,每次当水平面正好在鱼眼睛时,人们发现第二年便会是丰收之年。双鱼兆丰年一说越传越奇。

 这鱼如此神奇,以至于中国历来文人骚客,不吝华美想象,赋予其神妙之功。宋代乐史所著的《太平寰宇记》卷一二〇中载:“开宝四年……江上有石鱼见……鄙民相传丰稔之兆。”宋代王象之所著的《舆地纪胜》卷一七四写有:“在涪陵县下江心,有双鱼石梁上,每一鱼三十六鳞,一衔萸草,一衔莲花,有石秤、石斗在旁,三五年或十年方一出,出必丰年,唐大顺元年镌古今诗甚多。刘忠顺有诗,见在石上。”

 明代的《明一统志》《蜀中名胜记》,清代的《全蜀金石志》《重修涪州志》《八琼室金石补正》等,对白鹤梁石鱼都有不同程度的记录。

 白鹤梁这一奇妙景观,自唐以来,慕名前往的人不少,撰文赠赋盛行不已,慕古,访古,踏春,谈情……文人墨客相约游玩,江水拍打石梁,天地沙鸥渐起,好不快活,喝酒,谈天,会友,唱和,“到此一游”式的题刻,也以各种形式出现在白鹤梁上。

 中国素有刻石之风,从秦汉之时便初见其形,此后历朝历代盛行不衰。隋唐以后,尤其是宋代,随着文人文化的兴起,事无巨细地在石头上刻字成为潮流。在白鹤梁上,历史名人朱昂、刘甲、黄寿、王世祯等题刻均有出现,而名气最大的,当属一代诗人、词人、书法家黄庭坚。黄庭坚因被贬官黔州(今重

庆彭水),其间也曾到涪陵,也在白鹤梁上留下了墨宝。“元符庚辰涪翁来”,这一墨迹至今被传为“谜一样的作品”。黄庭坚自称为涪翁,可见对涪陵是有深厚的感情,没把自己当外人,不过黄庭坚在写“来”字时,写成了上下两部分——不去,写这句话时,他的贬官之途已然结束,要离开重庆,在白鹤梁上吹着江风,怅望长江,百感交集。这究竟是来,还是不去,黄庭坚的真实想法淹没在时空长河中,后人多种解释,无非是给白鹤梁又增加了一段佳话。

 揭开浪漫的面纱,这其实是一双科学世界里的鱼。

 白鹤梁题刻在重庆涪陵区城北的长江江心,石梁上刻有自唐代广德元年(763)至1963年间,长江涪陵段1200余年间的枯水水文。

 其实,在长江三峡库区目前留存的水文石刻近200处。其中洪水石刻174处,枯水石刻6处。如此丰富的数量,在世界上是罕见的。特别是其中的枯水石刻,体现了先民对江水观测的多样性。

 比如重庆江津莲花石,位于重庆市江津区几江镇东的长江航道中,石头上刻有南宋乾道中期至民国二十六年的水文题刻38段,记录了近800年的长江枯水水文情况。莲花石上一首《龙德新题诗》,经考证是清代道光癸未年(1823)所作。在重庆巴南区则有一块迎春石,位于巴南区麻柳嘴镇长江主航道南侧礁石岛上,石头上有宋、明、清等题刻十余段。而重庆江北区蒋沱村,露出一块耗儿石,因状如老鼠而得名,上有题刻内容为“大蜀明德三年碎词丙申二月上旬,此年丰稔倍常,四界安怡,略记之。水去此一丈。”

 在长江三峡的水文石刻群中,唯独白鹤梁题刻最为璀璨。在它现存的165段枯水题刻中,涉及水位观察的有108段。为长江航道运输以及现代水利工程的修建提供了参考,具有很高的科学价值。白鹤梁也因此被称为“长江古代水文资料的宝库”,中国千年“水文站”。

 白鹤梁上唐人所见的石鱼,是古代涪陵人用以观测长江枯水水位的独特标尺。每当江水枯落,石鱼出水后,人们便通过观察鱼眼与水位线之间的距离来判断江水的枯落程度。

 这种水文观测方法与现代水文站所使用的“水尺零点”(最枯水位的水位起点)的原理相同。石鱼最早的雕刻年代应该不晚于唐代广德元年,本有两尾,现在仅存一尾,以及其上的“石鱼”二字,“盖因岁尾,以其上的“石鱼”二字,“盖因岁尾,“开宝四年……江上有石鱼见……鄙民相传丰稔之兆。”宋代王象之所著的《舆地纪胜》卷一七四写有:“在涪陵县下江心,有双鱼石梁上,每一鱼三十六鳞,一衔萸草,一衔莲花,有石秤、石斗在旁,三五年或十年方一出,出必丰年,唐大顺元年镌古今诗甚多。刘忠顺有诗,见在石上。”

 因为修建三峡大坝之故,白鹤梁长久地淹没在江水中。即便如此,科考人员还是把白鹤梁的精华部分保存了下来,在其上修建了一个博物馆。

 水下世界是幽暗昏冥的,即便是被保护在舱房中,参观者要经过长长的电梯,下到水下展馆部分,距离水平面150余米。经过清理的江水浸泡着清楚是不太可能了,参观窗口旁是题刻的投影,帮助参观者辨认水中碑林的字迹。在水下环境参观廊道,其实非常安全,但常识告诉我们,铜梁铁壁外均是浩瀚的长江,我们不过是在一个可乐瓶子里参观水下世界,如此便不由得加快了脚步,好像龙王会随时发作起来,让人心生惊悚。

 回到地面,看长江波澜不兴,对岸青翠欲滴,好像做了一个长长的梦。

母亲

□刘剑波



小镇忆旧

 小镇人习惯称医生为“先生”。他们在路上遇到我母亲,都会叫一声“孙先生”。“路上”是指从我家去诊所的那段距离。诊所就在我家对过,但隔着一道沟壑,那道沟壑很宽,坡度平缓,彼岸就是鞋匠春支家,再往前走几步就是“麻木队长”家。诊所就坐落在春支家南侧。我母亲有时会翻过这道沟壑去诊所上班,叫她“孙先生”的小镇人往往会在春支家门口遇到她。更多的时候——比如雨后沟壑积水——我母亲会从包桂红家门口左拐去诊所。左拐就是唐麻子家。从唐麻子家门口往南,就是春支家的东山头。走这条路,跟我母亲打招呼打得最多的,当然是包桂红和唐麻子。包桂红的女儿叫包如姜,是我中学同学,同过座。有一次上化学课,教我们化学的黄汉升老师提问包如姜,水的分子式是什么。包如姜答不上,我便坏,在纸上写了“H3O”,推到她面前。包如姜如获救命稻草,得意地大声回答: H3O! 我现在仍记得黄汉升大发雷霆的场景,他像一头发怒的狮子,在讲台上左冲右撞。有一次他教生物课,讲人体的骨骼。他指着自己的下巴,问我们这是什么。我在底下小声说:屁股帮子。他耳朵尖,听到了。我现在想起他生气的样子,仍忍俊不禁:他嘴大张着,却一句话都说不出。

 包桂红的本行是修车,跟陆善堂和陈希芳一样,家门口就是露天修车铺。除了修自行车以外,包桂红还吹唢呐,唱京戏,主要是《红灯记》里李玉和的唱腔。包桂红脸形酷似浩亮,声音也与后者接近。有一次中午放学,恰在东街头的那条南北马路上遇到公社组织的彩车队环乡游行。彩车队由8辆彩车组成,内容为8个革命样板戏。当头的彩车是《红灯记》,只见包桂红穿着不

 知哪儿弄来的铁路工人制服,高举红灯,站在李奶奶和铁梅身后,岿然不动,气势吓人。所有目击者,包括我,都被镇住了。我不由自主地跟在彩车后面跑起来。我其实是想看看包桂红的“不动”到底能坚持多久。彩车一直往南行驶,过了“东海部队”西路口,进入十二大队的地盘,其间,包桂红高举红灯纹丝不动。不仅包桂红这样,别的彩车上的杨子荣、郭建光、严伟才、白毛女等人均如此。我不由得担心起来:绕全乡一周,至少要大半天,他们要小便拉尿怎么办呢? 小镇上脸麻的人不少,但唐麻子无疑是麻得最厉害的一个,但他的几个子女脸上都很光滑。唐麻子是商店职员,平时喜欢吹吹呼噜,信口开河,用小镇人的话说,就是“老相”“发甩”。有一次长沙中学邀请唐麻子作为贫下中农代表去对学生进行阶级教育,唐麻子又发起甩来,用普通话开讲。但唐麻子根本不会讲普通话,那只是本场话的变调而已,比如,他把“吃”说成了“切”。他上台就说:我今天要讲的第一个问题是关于鞋子(孩子)们切(吃)点心的问题。引得哄堂大笑。

 在我童年时代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以为母亲是一位医术精湛,妙手回春的大夫。这一印象来自于一张五十年代母亲在部队大院拍的穿白大褂的照片。白大褂罩在军服外面,母亲的脖子上挂着急诊器,收音管(胶管)大幅度垂挂下来,然后又攀援上去,形成一个美妙的弧度。这个弧度以听诊头伸进白大褂的胸袋而告结束。照片里的母亲矜持地对着镜头微笑着,显得又威武又将气。然而有一次,小镇一户做馒头的陶姓人家请母亲上门看病。母亲的业务水平受到了挑战,最终败下阵来。陶姓人家对母亲极尽诋毁之能事。听说此事,我受到极大伤害,同时内心有什么东西坍塌了下来。这时我才知道,原来母亲并非医生,诊所缺人手,才将母亲作为医生使用。母亲的诊本本领其实是护理,尤其特别擅长的是麻醉。而那张照片里的母亲当时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03医院某病区的护士长。那段时间我

 特别伤心,直到有一天邻县的一家医院派人专程接母亲去手术室做麻醉,声称要是母亲不去,那台手术根本无法完成。这件事修复了我内心的创伤,我仍然觉得母亲是最棒的。那时,长沙公社卫生院也频频用手扶拖拉机来接母亲去帮忙为病人输液。母亲总能在错综复杂的草丛中迅速准确地找到生命的小径,令年轻的护士汗颜不已。

 母亲严肃冷漠,不苟言笑,鲜有温情。我曾经以为这是母亲的军旅生涯所致。小时候,每逢周末,我和姐姐、弟弟去小镇的南边接在县医院上班的母亲。那时的公路很原始,厚厚一层沙灰,公共汽车在上面行驶时,远看就像一条蜿蜒的泥龙。一个星期没见母亲,我们都很想念她。我爬到一棵树上向远处的招呼站方向瞭望,姐姐在树下仰头问我,看到了吗? 我说,没有,一个人影都没有。过了会儿,姐姐又问我,看到了吗? 我说,我只看到风把沙灰吹到天上去了。姐姐很气馁,一屁股坐在地上教弟弟玩挑绷绷。这时我看到远处出现了一个人影,因为距离太远,人影很模糊。我固执地认为,这就是母亲。我又紧张又兴奋,心怦怦直跳。人影变得清晰了,正是我们的母亲。母亲骑着女式自行车,整个人趴在车龙头上,自行车的车轮在几寸厚的沙灰里往前艰难地转动着。我激动地喊着,妈妈来了,妈妈来了! 姐姐和弟弟从地上跳起来,我省略了下树的步骤,从树枝上一跃而下。我就像掉进了干燥的泥潭里,整个人都埋了进去。当我站起来时,无数泥沙组成的瀑布从我身体的各个部位倾泻而下。

 母亲来到我们的面前,我们都欢呼着迎上去。母亲从自行车上跳下来,差点摔在地上。终于见到了母亲,我们都欣喜万分,我们都渴望得到母亲的亲昵举动,比如抱一下我们,或在我们的额头上亲一下。但母亲不仅没有这样的举动,甚至连笑脸也没有。母亲很不高兴地责怪我们:谁让你们来的? 接着,我们和母亲一起走着回家。一路上谁都没有说话。回家的路漫长得像一个人的一生。长大后我才知道,多年前的那场家庭灾难折断了母亲的生命之旗,那时她才38岁。